“习近平跑遍了福建各个角落”

——《习近平：正圆中国梦》选载

□ 〔俄罗斯〕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从游击“特区”到“经济特区”

要理解就任新职位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就需要了解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与“邓小平”这一名字相连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是由一批党的老一辈杰出领导人共同制定和实施的。他们参加过长征，曾在日本侵略、汪伪投降、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建立“特区”和“革命根据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是其中的一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陕甘宁特区的领导，后又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负责人。习仲勋所负责的地区是当时既安全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少数地区之一，这里有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延安。

被罢黜16年后，习仲勋于1978年被平反，并受中央委托到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整顿秩序。这是一个毗邻原英国殖民地香港和原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省份。在这个地区调研时，这位老革命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作为一个大型工业城市，广州居民的收入仅仅占毗邻的英国殖民地居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中国公民，尤其是年轻人，通过一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逃往香港，甚至不惜溺死在界河中。

在回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习仲勋建议不要建造“香港墙”，而是相反，要缩小广东与香港的生活水平差距。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广东经济自由化，降低贸易壁垒，吸引各类投资。北京领导层对该计划的反应十分谨慎，但邓小平最终让这位自己的老战友在与港澳毗邻地区进行改革试点。“我们就称它们为‘特区’吧，你的陕甘宁边区一开始也是称为‘特区’的”，邓小平说道，并补充说，无法给这个大胆计划划拨资金，他会给相应的政策。因此，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第一批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与港澳毗邻）、广东东部的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

在1985年6月习近平到达厦门经济特区前，这里已经做了许多大事，但这位充满活力、大胆创新的领导人还想做更多的事。此时，习近平首次表现出了做长期规划的意愿，领导制定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他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主导协调解决了计划单列涉及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1994年厦门市在中央政府的地位提升至“副省级”，这个级别的城市共有15个，享有特殊优惠政策，国务院直接解决其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中的问题。

福建省尤其是厦门市有悠久而独特的历史。两千多年以来，福建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中心，还是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中国人（即华侨）的移民之源。据估计，南洋3000万华侨中800万来自福建。把厦门定为第四个经济特区也是考虑到了华侨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们的资金和经验，这一考量是正确的。在外富裕起来、讲着闽南语和客家话（广泛分布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南洋其他国家的一种方言）的福建人，陆续返回自己祖居的城市和村庄。大多数福建移民还是生活在台湾岛上，狭窄的海峡将两岸隔开。海外华侨最初出于爱国主义情怀、对不断发展的祖国的自豪感和对祖辈土地的热爱，回乡兴建学校、寺庙、医院和道路。但他们很快就看到了商机，开始筹建一些小工厂和贸易公司。随着中小商人之后，资金雄厚的银行、大型制造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落地，大商人也来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沿海四省的发展速度开始比中国其他地区快。

一部分人富了起来，但其他人仍然过得很穷。1988年，习近平被从富裕的厦门调到福建省北部非常落后的宁德山区工作。

新的任命，新的考验

习近平曾在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沿海城市厦门工作过3年。在此期间，他积累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丰富经验，知道与“海外华侨”打交道的好处和问题，深入了解复杂的对台关系。也正是在厦门，他于1987年9月与业已成名的歌唱家彭丽媛结婚。他们没有去度“蜜月”，而是只在一起度过了短短4天的“蜜日”。彭丽媛有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她是一位越来越受到大众喜爱的歌唱家，时而在北京参加比赛，时而去加拿大、美国等地巡演。

习近平心甘情愿去了穷乡僻壤。他考察宁德的山村，与百姓交流，调研这个自己所负责的中国偏僻角落。出乎他意料的是，在福建省内，宁德竟然还是全国最贫困的18个地区之一。一些村庄甚至没有通公路，习近平前往这些地方只能徒步穿行在泥泞的道路上。即使通了路的，同样也是一种考验。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后，习近平背疼得连下车都困难。

要与当地人找到“共同语言”并不容易。当地居民讲闽南方言，而新来的书记讲的是中国最通用的语言，即普通话。习近平还会说陕西方言，这是在他父母的家、在“文化大革命”下放期间当地所说的方言。办实事比说话更重要。在宁德的村落里，几千户贫困农民世代居住的茅舍得以重建，多少年来一直以船为家的渔民也住进了结实的新居。

在宁德工作的3年间，习近平提出了“下基层”的口号，开始建立新的党群互动关系机制。他要求党内下属干部直接接待百姓投诉和信访，经常关注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定期发动“头脑风暴”，因地制宜制定政策，积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在宁德，他开始制定与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现象斗争的规章，在审查违反建设规定和国有房屋分配规则的案件时，习近平严厉批评地方党委和其他领导机构的工作人员：“你怕得罪谁？几千名官员还是几百万老百姓？”在他领导宁德的3年里，共审判了400多名腐败干部，深入调查了轰动全国的重大案件。

1990年，习近平晋升为福建省会福州市的市委书记，他又回到了大城市。福州是化工、纸浆和造纸、食品加工、印刷、纺织等行业的重要中心。早在1984年，福州就已是“开放城市”，这使它更容易吸引大量外资。省城人口700万，是厦门的两倍。总之，这里可以让人一展才华，而习近平也的确得以大显身手。

1992年，在习近平倡议下通过了“福州3820工程”，该计划提出未来3年、8年和20年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所有这些目标几乎都按时实现了。由中国汽车、电子、铝业重要生产商参与的几个超大型项目成功实施，城市新型现代工业基地得以建立。12个大中型国企获党的领导批准，允许吸引外资。习近平一直都在与党政阶层中的官僚作斗争。福州通过了更易吸引台商投资的《加快行政审批流程的章程》（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台湾被视为中国的一个省，台商不是外国人），然后着手制定了《有关福州居民办理行政审批手续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使台湾、大陆和外国的企业家更容易开展工作，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1993年，习近平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的同时，兼任福建省常委、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9年，他又晋升一级，担任福建省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次年，习近平的行政职务中去掉了“代”字，成了福建省省长。从初到福建省任职，至此已有15年时间，此时这里已是富饶发达之地。在此期间，他在“首批经济特区之一”的古城厦门工作了几年，在落后的宁德地区工作了几年，又在省会福州工作了几年。习近平按照自己特有的习惯跑遍了福建的各个角落，了解了福建的优势和劣势，并孕育了新的计划。

治国从福建开始

福建有3700万居民、12.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6万平方公里的水域，有着几千年丰富的历史、便利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港口，与“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隔海相望。便利的港口和发达的海路交通将它与东南亚诸国、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在一起，这一海路是保存至今的“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有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有种植着名贵品种茶叶的茶园，其中包括著名的“乌龙茶”；还有保存完好的寺庙、佛塔和园林以及独特的方言等等。这么多的财富和奇珍异宝对于欧洲、亚洲乃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资源。但对福建而言，在改革开放12年后仍面临不少问题。因此，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后，便立刻着手组建了旨在提高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用官方语言可称为“指挥部”，但它摆脱了官僚的束缚，可全权处理具体问题。“头脑风暴”的结果是在第一年内行政审批事项就减少了40%。

习近平执政福建期间制定了全国首部“政务公开实施条例”，要求在所有城市、区及镇政府机关推行政务公开原则，推广鼓励公务员遵循新方针的赏罚制度，并建立公众投诉中心，听取群众意见。福建在全国最早启动有关保障食品生态安全的工作和“放心食品”的品牌体系建设。依托自己的新职位，习近平加快了“数字化福建”规划的实施。该规划是他在1999年提出的。在接下来的10余年间，这张看不见的“网”逐步扩大并覆盖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社会生产，从行政事务到市政服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附录中说：“2010年，福建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全省医院就诊‘一卡通’的省份。”

关于习近平在福建所取得的政绩，跟我交谈的中国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是建立“生态天堂”。福建是中国唯一一个水、空气和环境质量总体评定为优的省份。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并不是“绿色和平”组织的积极分子，但他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建设“生态福建”的战略构想，并亲自监督实施。“我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习近平常说的一段话。

管理福建需要制订长期规划，需要处理许多日常棘手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年轻的领导人从事科研工作。1998年，习近平还报名参加了母校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在职学习，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并于2002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2000年2月，习近平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明义一起被召至首都，就“远华”集团案向江泽民主席、胡锦涛副主席、朱镕基总理和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做出解释。“远华”案涉及走私及其他非法犯罪行为，这些行为与建在厦门的88层摩天大楼有关。这起案件成为沿海省份发展迅速却偶尔失控时期的一起最大丑闻。除当事人被绳之以法外，还有数百名不同级别的官员纷纷落马。福建省高层并没有被牵连到这件丑闻案中或受到不良影响，而且国家领导人对这位来自福建的党的后起之秀非常关注。

创新需要勇于开拓的精神状态

□ 王怀超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认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借鉴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把这五大发展理念视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思想引领与行动指南。这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论述五大发展理念时，把创新放在首位。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足见创新地位的重要。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创新，首要的是理论创新，理论既是行动的先导，也是实践的指南。没有理论创新，其他创新则无从谈起。即使有所前进，也难以持久。因此，必须把理论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所谓理论创新，就是用一种新的理论取代旧的理论，用一种新的理念取代旧的理念，用一种新的学说取代旧的学说。一句话，就是用一种新的认识取代旧的认识，就是观念的变革，理念的创新。说到底，理论创新是一种思想革命，是灵魂深处的一种革命，是认识和理念的脱胎换骨，因此，必须有一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大无畏的气魄，让人们的思想从僵化的、过时的、陈旧的、错误的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这也就是党的十八大所倡导的“坚决冲破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的社会转型期，就是需要这样的精神状态，就是需要这样的大无畏气魄。其实，改革，说到底是制度和体制创新，就是要扬弃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经济改革说到底是经济制度创新。这就需要有一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的革命精神。否则，改革就无从谈起。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支撑，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都是难以生存的。对于一个正在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个精神上空虚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振兴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大业，没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一股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是难以想象的。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思想解放的程度往往决定着社会变革的深度。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其实，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大胆探索、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改革每前进一步，就要清除一个思想理论障碍，每清除一个思想理论障碍，改革就前进一步。这些思想理论障碍，主要是传统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

就我国社会科学界理论创新的现状而言，不容乐观。就整体而言，我国社会科学界思想还不够解放，各种报刊书籍多是回顾性、注释性、宣传性的内容，不少是低层次的重复。理论创新成果不多，原创性成果更少。理论创新的速度和成果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实践需要。当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老一代专家学者陆续退出，一大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也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现状与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不相符合，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相距甚远。其突出问题是，全国社会科学界中青年学者较少，领军人才缺乏，有科研含量的学术论著少。鉴于此，必须迅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氛围、机制和条件。花大力气造就一批社会科学界各学科的中青年理论家，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学术研究骨干，这是理论创新的当务之急。

发展与现代化

将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增进人民福祉上

发展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共享提供物质基础。共享才是发展的初衷和目的。只有破解共享路上的拦路虎，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蒋　茜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指南。其中，共享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体现了“十三五”发展目标的核心价值，即小康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小康，这一理念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落实共享发展理念需着力解决现实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人民收入普遍增长，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民生建设取得显著的成效，我国已经成功迈入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应当看到，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共享发展相对滞后，还存在不少短板，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社会民生领域所积累的一系列问题、矛盾开始凸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收入差距问题。有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9，远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标准。这虽不能完全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情况，但基本能够说明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还比较大，而由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形成的收入差距更为突出。

社会保障问题。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日趋完善，但不可否认，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流动性与可持续性问题依然明显存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滞后。截至2014年底，全国还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急需脱贫。

教育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强国之基。当前我国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全覆盖，但教育质量不高，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问题比较突出。而教育质量也从源头上影响了就业的水平，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成为困扰就业最主要的问题。

公共服务问题。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存在不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并不是同等地享有公共服务，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比较明显。

破解共享发展难题的对策建议

基于此，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着眼于破解共享发展的难题，“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从八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推动共享发展的具体思路，这些措施抓住了当前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也呼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诉求。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共享不可能建立在两极分化之上，但共享也不是平均主义，体现在收入分配上，就需要公平公正地分享发展成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使劳动致富真正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普遍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建议》提出在坚持两个同步的基础上，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为接下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指明了方向。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扶贫方面，针对7000多万贫困人口问题，需要“供血”与“造血”相结合，因人因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措施脱贫，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可通过实施农村低保制度，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同时，需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力求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提升共享发展的能力。《建议》提出需要继续深化教育改革，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城乡教师交流，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公正，努力全面提升教育的质量，而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可以为当前经济转型所需要的高质量劳动力做好准备。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通过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建立创业服务平台，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共享发展的水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强烈，为了更好让全体人民共享公共服务，需要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不断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落实共享发展理念需要把握的关键点

需要从思想上提升共享认识的高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需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把共享发展的思想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真正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障碍。在实践的推进中，一项好的政策能否得到最终的落实，畅通渠道，破除各种利益的阻挠很关键。这就需要勇气和智慧，按照共享发展的理念，冲破利益藩篱，贯彻落实到位。

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形成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共享发展得以实现的有效保障。通过经济制度的完善，不断释放经济活力，为人民获得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提供保障。通过政治制度的改善，进一步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完善社会管理制度，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保障人人共享发展成果。通过文化制度的建设，提升国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加强生态制度的建设，让人民共享美好的生活环境。

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